



贺雄飞 主编

重新发现历史

对中国传统文化软肋的剖析

REDISCOVER
HISTORY

刘济生 著

以全新的视角解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重谜团

尹振环 杨继绳 黎鸣 吴思 联袂推荐



贺雄飞 主编

重新发现历史

对中国传统文化软肋的剖析

REDISCOVER HISTORY

刘济生 著

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辉 贾理智

责任印制：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新发现历史 / 刘济生著 .—北京 : 华龄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178-717-0

I . ①重… II . ①刘… III . ①中国—历史—研究
IV . ①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2097 号

书 名：重新发现历史

作 者：刘济生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20×1030 1/16 印张：23

字 数：240千字 印数：1~8000册

定 价：32.00元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 编：100009
电 话：(010) 84044445 传 真：84039173

中国人如何从历史中突围（序）

历史学家在社会里生活和工作，他们的职责一般只说明这些社会的思想，而不是纠正这些思想。

—— [英] 汤因比

人体解剖对于猿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 [德] 马克思

刘济生教授虽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周恩来的专家，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有更深刻的研究。用著名历史学家吴思的话说：“刘济生教授《重新发现历史》是一部力作，尤其是‘秦家店’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本质。”此书是刘教授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呕血之作，用七、八年的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软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系统的剖析，以全新的视角解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重谜团。通过对“秦家店”的批判，分析了中国秦王朝的政制与阶级基础；通过对帝王文化的阐述，揭露了中国历代帝王的阴暗心理、腐朽生活和血腥争斗；通过对历史上左倾现象的描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一些变革的负面作用；通过对孔孟之道的解读，总结了儒家思想的精华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中国人重新分析历史和认识历史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达到了新的高度。

法国年鉴派大师犹太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曾引用十分宠爱的小儿子的一句话：“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童言无忌，马克·布洛赫幼子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中国的许多学科是经不起这样一问的。这样的话，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必须回答，而要作出自己或别人满意的答案，恐怕许多人的

内心未免有些惶恐不安。就仿佛一位年迈的工匠在临终时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个行当值得吗？我做了一辈子的所谓“事业”究竟有用吗？给人类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到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更与人类历史和文化的进程有关。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对历史的研究仅局限于“真相”这个层次，还没有到了每个人都能反躬自问：我们的古人努力向历史学习了吗？我们值得怀疑的历史究竟有什么智慧？我们的历史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了吗？无论是于丹，还是阎崇年、易中天之流，不管你如何“巧舌如簧”，如果不能从历史中找出规律，不能从历史中总结出智慧，那就是用历史故事来消磨无聊的时光。历史永远不会背叛我们，只是我们的功利、浅薄和无知背叛了历史。我们每一个以历史探索为乐的学者都必须回答那个犹太小孩的问题：历史究竟有什么用？

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类少犯错误、有所作为，历史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要洞悉历史，首先要和现实保持亲密接触，正如一位比利时历史学家所言：“如果我是文物收藏家，眼睛就只会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对此，马克·布洛赫大加赞赏，正是这种要求理解生活的欲望反映出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一位历史学家若对周围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漠不关心，那就只能称为“古董迷”，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真正的历史学家，可以察古知今，也可以由今知古。书斋就是历史学的实验室，而治史的灵感有时偏偏来自现实的启示，有时要超越现实，有时还要超越历史。写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马克思那句至理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很显然，历史也是一把打开现实的钥匙。

奥巴马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后，遇到的第一个考验，不是人祸却是天灾，竟是爆发在墨西哥的猪流感（甲型H1N1）。虽然人们皆未预料，但奥巴马却不是毫无准备——因为，在此之前的2005年8月前总统小布什在德克萨斯农庄度暑假时，随身带了3本500页的厚书，其中有一本名叫《西班牙流感》。同年11月，小布什要求美国国会拨款71亿美元，推行一项全面的流感防治计划，奥巴马现在遵行的，就是这一计划的主要措施。而那本讲述1918年流感大灾难的书，是美国图兰/泽维尔生物环

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约翰·巴里所著的《西班牙流感：史上最致命瘟疫》，无疑对人类防治这次大灾难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中国2003年的“非典”和汶川的“5·12大地震”，推动了中国救援体系的大革新。这就是历史对现实巨大的推动作用。

可悲的是，历史常常并不是冷静、清醒和公正的，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常常站在统治者和成功者那一面，有意扭曲或夸大那些胜利者，贬低那些失败者，给许多著名人物加上一些传奇性的东西，每个伟人在历史的镜片下显得总是比他本身还要伟大得多——无数小人物被剥夺了，都加到了大人物的头上。正如犹太文学大师茨威格在《历史是公正的吗》一文中所言：“读历史不能深信不疑，而是应当好奇般地加以怀疑，因为看来是铁面无私的历史依就屈从于人类对传奇和神话的强烈爱好——它有意和无意地把少数几个主角加以英雄化，而把日常生活的主角，第二流和第三流的英雄人物推到黑暗之中。但传奇恰是通过诱惑，通过求全求美的光泽，而成为真理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去经常对它加以验证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成为我们的义务。”他痛心疾首地指出，“在一次性认识到的伟大面前毕恭毕敬，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在官方的神圣权力面前卑躬屈膝没有比这更灾难性的了！”因此，他呼吁道，“我们必须永远把历史内部中正在添加的和已经添加的重新改正过来，给真正的业绩以纯正的和公正的尊敬，以此来对抗人类那种在成功面前低声下气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世俗的权力总是以阴谋和暴力来实现其残暴的统治的，因此，如果我们对胜利进行盲目的顶礼膜拜，而不去分析这些成功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成功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亵渎。我们拒绝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踏着成千上万与他同甘共苦的伙伴的鲜血登上权力的顶峰，不能把强盗和掠夺者事先就看作英雄。只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以诚实和公正的态度去评价权力，这才是人类道德和文明的天平。因此，历史学家的首要和迫切的任务就是，以良知和良能去揭露和批判假面具，用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话说，就是要对那些伪装和编造“开庭审判”，把那些用谄媚逢迎和不择手段涂抹出来的历史人物传唤到我们的个人法庭面前，为那些被忽略者，被遗忘者和被蹂躏者提供出庭作证的权利。

黑暗和堕落通过历史闯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把我们弄得垂头丧

气和心灰意冷。年轻的一代应当比我们过得更好更幸福，更有人情味，因而为了使他们不再次学坏和被污染，必须在他们的心灵还像蜡一样可塑的时候，就及时地受到更真实更人道的教育，而这种更新的教育首先必须改变我们成人的历史观，寻找一种新的模式，走出历史麻木和阴暗的“潜规则”，超越阴谋、暴力、专制和游民的大循环，通过解冻、解禁、解密和解构这条规律，阐述一部新的文明和智慧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彻底走出中国历史的宿命。如果我们每一代人永远都浸泡在上过色的、伪造的、人工制成的历史标本中，那我们就永远是历史的囚徒和没有意志的奴才，我们的历史也就是永远倒退而不是上升的历史。

明天的历史应当是全人类的历史，与全世界共同的进步和幸福相比，许多帝王和丑陋文人的卑鄙行径是不值一提的。克鲁泡特金王爷曾写过一部书，名叫《人类和动物界的互助》，在这以前，连篇累牍的教科书只是告诉我们，人为了生存如何要诡计多端，疯狂地仇视和弱肉强食，用阴谋和暴力互相消灭是唯一的欲望和本能。而那本书中，却用丰富的事例证明，人和动物也有过互相帮助而不是残杀的令人感动的历史。如果说动物是无理性，不可教育的，那我们人呢？我们人是有智慧的，可教育的，甚至还有上帝和佛祖在遥远的天国唤醒我们的良心，让我们摆脱兽性和恶劣的本能。难道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连动物都不如吗？当今世界里有足够的诽谤者，把知识分子打成替罪羊，如果一个社会里连知识分子都消失了，那我们的历史还有理性、正义和激情吗？

通过刘济生教授的《重新发现历史》一书，激发了我对历史重新思索的兴趣，让我们变得更加理性和深刻。

贺雄飞

2010年8月10日于北京陋室

目 录

第一辑 秦家店批判

暴君政体

——秦家店政制之一 3

野蛮下的暴政

——秦家店政制之二 11

反“封建”不反专制

——秦家店政制之三 18

分封制最后的消亡

——秦家店的政制之四 28

朝廷命官制

——秦家店政制之五 37

一人之天下

——秦家店政制之六 41

贵族集体消亡之谜

——秦家店的阶级之一 45

小农经济“万岁”

——秦家店的阶级之二 60

打击商人

——秦家店的阶级之三 63

被帝王玩弄的士	
——秦家店的阶级之四	67
凡暴政 必速亡	
——历史上暴政速亡的第一个实例	75
第一顶皇冠与屠杀	
——开国皇帝合法性问题	80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吗	87
李白肯定了秦始皇吗	90
秦家店的回光返照	93
“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重新解读	99

第二辑 帝王文化

掩盖的文化

——三大传统文化，还是四大传统文化	115
贪官无虞——兼谈中国政治保护伞	126
不可思想与独尊一术	129
屠戮功臣——兼谈范蠡定律	133
大搞祭奠	135
书写伪史——兼谈史家之难	138
离我族类其心必异	
——汉武帝政治心理分析	143

斩草除根——兼谈帝王如何巩固皇权 ······	150
封闭的皇宫——兼谈西方宫殿的开放 ······	153
谋权第一——兼谈谋国、谋天下 ······	156
疯狂行政 ······	160
帝王观念的普及 ······	164
自我吹捧 勒石记功 ······	167
表儒内法	
——皇帝老儿真的独尊儒术吗 ······	170
诛心洗脑 ······	175
告 密 ······	179
长生不死 ······	182
大筑宫殿 ······	185
中国的拆毁文化 ······	191
酒池肉林——帝王的病态饮食 ······	195

第三辑 历史上的左倾现象

管仲——国家垄断的祖师爷 ······	201
商鞅的军人专政 ······	207
国家垄断实践者：桑弘羊 ······	214
社会主义者王莽 ······	221
王安石与“文革” ······	230
朱熹对人性的挞伐 ······	251

疯狂的极左——洪秀全	259
《大同书》与全盘公有制	264

第四辑 孔孟之道解读

孔孟反极权专制十论	271
孔孟仁政十论	279
孔孟的初步的人权思想	287
孔子的文化价值及其致命缺陷	
——与薛涌先生商榷	289
“刑不上大夫”与少数人自由	301
孔孟思想为何难以实行	305
民本主义及其缺陷	310
伦理政治的辉煌与末路	315
孔子诛杀少正卯辩	320
失去锋芒的后儒	323
儒将之死	
——岳飞的政治理念	328
“孔家店”比“秦家店”更可怕乎	335
“打倒孔家店”百年风雨	339
后记	352

第一辑 秦家店批判

暴君政体 ——秦家店政制之一

历史是一面镜子，秦王朝就是极权专制主义的一面镜子。而所谓的秦家店是指一种专制政体和暴君制相结合的政治统治，我们可以简称为暴君专制政体。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是专制政体，在这个体制中暴君的出现是经常和必然的现象，专制体制本身就已经很黑暗了，加上暴君，这样的社会可想而知。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是秦家店专制体制的翻版，秦王朝这个原创性的包括终身制、世袭制、等级制、宗法制的黑店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政体，这些本书不作论述，因为论述这些专制体制的著述很多。本书将论述秦家店另外四个被秦始皇实践得特别突出的体制：独揽一切的专制、舆论一律、愚民政策、密谋政治。

独揽一切的极权专制

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一伟大著作里，系统论述了古代社会的政体。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政体提供了方法论。中国近代的学人把秦王朝定位为专制主义君主制。今天我们有必要对秦王朝再进行政体方面的分析。

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当时的希腊，认为存在五类政体。“第一种是诗史（英雄）时代的君主制，其君主受到臣民的拥戴，但权力有一定的限制，君主就像一名统帅和法官，并主管宗教祭祀事宜；第二种是野蛮民族的君主制，其君主的职位在王族中世代相传，依据法律实行独裁专制；第三种君主制是民选邦主制，其君主类同于民选产生的僭主；第四种是斯巴达的君主制，进而言之，其君主是在王族中世袭、终身任职的统帅。……

第五种形式的君主制，其君主独揽一切权力，正如每一个民族或城邦掌管公共的共同事物；这种体制同家长制一致。家长就像一位管理家政的君王，而君王就像一位管理一个或多个民族和城邦的家长。”^①亚里士多德在论述野蛮民族的君主制时谈到：“另一种形式的君主制在野蛮人中间常常可以看到，同僭主和暴君制很接近。但这种君主制依然依据法律，并是世袭的。因为野蛮民族的性情天生就比希腊各民族更具奴性，其中亚细亚蛮族更甚于欧罗巴蛮族，所以他们甘受独裁专制，并无犯乱之心。这些君主因而多为暴君，他们可以通过世袭或依照法律安安稳稳地占据王位。”^②

秦王朝的政体肯定不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第二、第三种政体，而几乎同时存在第四种、第五种政体之综合。

秦王朝君主的职位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种，君主受到臣民的拥戴，权力有一定的限制，君主就像一名统帅和法官，并主管宗教祭祀事宜。也不是第二种，“在王族中世代相传”，而是在国王一族之中相传，也不是“依据法律实行独裁专制”，而是法外依然可以独裁。只是“野蛮民族的君主制”这一点恰恰符合秦王朝的特征。秦王朝也不是第三种，民选邦主制，其君主类同于民选产生的僭主，秦王朝是地地道道的世袭制。

秦王朝符合第四种斯巴达的君主是“终身任职的统帅”，更像第五种形式的君主制，其君主独揽一切权力，这种体制同家长制一致。所以，中国的秦王朝的政制是集中了西方所有专制方式的弊端，是人类所有专制体制的集大成者！秦王朝是亚里士多德所列最坏的一种专制主义极权制。

专制体制当然是一个人说了算。开明专制是皇帝让臣下帮助出主意。昏庸的皇帝和暴君也是专制，但只是一个人胡乱拍板。秦始皇后期统一天下就开始了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同样的专制体制，不一样的皇帝个人。秦王朝的历代国王都是大权独揽，没有什么争论的，只是在秦始皇时期又强化了权力的集中，出现了极权政治的特点。这一点仍然和法家的理论有关。荀子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③君权旁落就会导致政治动乱。韩非主张君权的绝对性和不可分割性。《内储说下》中写道：“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在韩非看来，君王连百分之一的权力也不能下放，给百分之一，下面就用到百分之百。在《外储说又下》说：

^① 亚里士多德·论政治·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5

^② 同上.103

^③ 《荀子·议兵》

“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臣共权以为治？”韩非打比喻，即使能工巧匠的王良、造父两人一块赶车，也不能驾驭马，只能一人驾驶。君王怎么能和臣子共同掌握大权呢？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符合韩非主义。

韩非主张要充分运用“法、术、势”，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驾驭群臣和老百姓，使他们无一点实际的权利。韩非说的“法治”是绝对不治君王的。他的法治在治百官和百姓这一点，好像比人治要强一些，但不治君王，最后还是人治。那么，君王真的用法来治理百官吗？非也。用法来治百官，官员们在法的范围内就不应该怕君王了。其实君王法外的权力更是大得不得了。

韩非在《备内》篇里写道：“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就是说对谁也不能相信。在《八奸》里，他认为对同床的妻子、亲生的儿子、身边的亲近等等都不能相信。他认为“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至于外人就更不能相信了。特别是对关东六国，秦始皇根本就不信任，非杀既奴。把六国贵族千里迢迢迁往咸阳附近。人性有恶的一面，但是人不一定都是坏人，好的环境可以把人塑造成好人。不管什么条件下，把人都当成坏蛋，当成十恶不赦的野兽，这是说不通的。这种观点是为专制政治镇压人们找寻人性方面的理论根据。

秦始皇独揽一切还表现在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和官员派遣制。

这个问题特别复杂。分封制并不是我们某些人理解的分裂，它其实是人口稀少、原始农业社会条件下的一种国家管理形式。它的最大优点是权力的分割。这种管理体制能促使正常的经济竞争，会带来商品经济的发展。郡县制是比较适应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在一个庞大的农业社会实行郡县制是有利于政治统治而不利于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反复证明了的真理。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会通过郡县制在全国实行。当交通不发达，信息不畅通，郡县制必然带来信息的失真和政策的走形。当郡县制有利于政治统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殆尽，反过来又进一步压抑了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最终和分封制同样导致了分裂下场。由于秦始皇采纳了郡县制，使中国经济两千年来一直停滞不前，中国长时间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繁荣的商品经济了。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整个社会实行郡县制，使商品经济的交换失去了原动力。各个地区的商品交换没有必要了。“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

这样的名言一方面说明了江南的富足，一方面说明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强大行政力量调剂了经济的有无。江南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往各个朝代的帝都，大一统就是超经济强制。大一统使文化窒息了，百家争鸣成为不可能。中国人聪明过度，在那个时候就发明了郡县制。郡县制在中国是搞早了，当然也是搞糟了。顾炎武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郡县制带来的另一个必然后果是官员派遣制。由于郡县制的实行，使过去由贵族上层人物担任地方管理者变成为皇帝的直接派遣和任命。皇帝派遣下去的各级官吏完完全全是对皇帝和朝廷负责，他们的权力掌握在皇帝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下面民众和地方势力的手中，所以他们可以只对上负责，而不可能对下负责。“奉上唯恐不周，克下不惧民怨。”天子的大员，皇帝身边的大员，他们来到地方，就是地方的“皇帝”。皇帝是稀里糊涂也好，聪明绝顶也好，天下总是一片贪官污吏，老百姓总是任人宰割。秦始皇留给后人的这一体制在两千年来危害至深且巨。派遣制带来了权力监督的单向化，各个地方的权力只有上面的单一监督。横向之间失去了监督，各级官僚只要打发好上司，就平安无事了。“对上负责”成为中国官场的铁律。中国几千来的腐败痼疾形成了强大的惯性力，越来越强大，也就越发难以医治了。

舆论一律与壅私学

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具有极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它在教育上解构了文化专制，对于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对于权力的舆论监督都具有积极作用。到了秦始皇三十四年，私学在李斯的建议下被废除了，李斯的理由是维护秦始皇的绝对专制。李斯说：“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如则非心，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众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①可见，私学和官方的“法教”是不相容的，它是在皇权淫威之下不同的声音，从社会进步上看，是有利于皇帝少犯罪孽的一种社会舆论监督。李斯来一个“禁之便”三字了事。没有议论了，皇帝做什么坏事都没人说，方便得很。后来皇帝基本上是不容许私学来议论国

^① 《史记·秦始皇记》